

海南先贤诗文丛刊
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

钟筠溪集

上册

（明）钟芳著

海南出版社



海南先贤诗文丛刊
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

主 编 洪寿祥
执行主编 周伟民

钟筠溪集

上册

(明) 钟芳 著
周济夫 点校



海南出版社



前 言

在现在能看到的琼人诗文中，南宋白玉蟾的《白真人集》，明代丘濬的《琼台诗文集》、钟芳的《筠溪文集》（亦称《钟筠溪家藏集》）、海瑞的《备忘集》、王弘海的《天池草》，以及清代张岳崧的《筠心堂集》、云茂琦的《阐道堂稿》、冯骥声的《抱经阁集》等，是篇幅较大、较有分量的几种。而其中理学思想比较突出，学术色彩比较浓厚者在丘濬《琼台会稿》之外，当推钟芳的《筠溪文集》。

明代是海南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段。对其文化繁荣、人材辈出的状况，钟芳在《琼州府学科目题名记》中曾有描述：自洪武十七年之后，“琼士捷京闱、登会选者，绳绳有人，合南北之士褒然与之颀颀，无少贬焉。自此位省部，跻台阁，琼之名与曲江并隆，盖非偶然之故矣。”而在明代众多的人材中，钟芳正处在上承丘濬、下启海瑞的位置上，所以对其诗文集进行解读，对于正确勾画出明代海南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轨迹，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钟芳的诗文，生前并未结集，他逝世后的嘉靖二十七年（1548），才由长子允谦编辑刻印。可能是印数不多，

所以流布并不广。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此集由宁波天一阁藏书楼进献，但只保留存目，其书并未编入。到民国时期王国宪出版《海南丛书》时，已未能见到《筠溪集》原本，只将搜辑到的几篇文章和数十首诗付印。所幸北京大学图书馆尚藏有允谦刻本，齐鲁书社于一九九七年编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得以据此刻本影印出版，我们现在用以校点的底本，就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影印本，基本上保存了原刻本的面貌。全书共有三十卷，卷一至十九为各体文章，卷二十五至三十为诗歌，其余五卷则为读书札记、琼崖各论、夷情要览、皇极经世图续等。由于它体裁的多样，涵盖的广泛，见解的精醇，文辞的雅达，在明朝的作者中，足可占上一席之地，而对于海南来讲，他的学术地位则仅在丘濬之下，确无愧于岭海巨儒之称。

为了论述的方便，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钟芳（早年曾名黄芳，后始改复钟姓）的生平。他是海南崖州人，海南在中国之极南，而崖州又在海南的极南，即使是在明代，也仍然是十足的穷荒之地。钟芳出身寒微，自小目睹地方的动乱不断，百姓的朝不虑夕，而琼人的读书与出仕的不易，也使他历尽艰难，这对他入仕后形成同情民生疾苦、意欲施行仁政的思想与刻苦砥砺、真知力行的学风，是很有帮助的。他出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自幼颖

昇,十岁即进州学,弘治十四年(1501)中举人第二名,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二甲第二名,随即选为翰林庶吉士、编修。作为进身之阶,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其后却并未一帆风顺。不久即因忤时贬为宁国府推官,却因精于吏事,以能折滞狱而远近知名。正德七年(1512)升漳州府同知,寻代理知府,敢于任事,对平定漳寇、禁覈中官与擒捕豪猾,皆有作为。正德九年(1514)升南京户部员外郎,遂署南吏部稽勋司郎中,转考功,甄别官吏的优劣,上司刘春、罗钦顺都听从他的意见,并因此而实授其职。正德十三年(1518)南归祭扫。正德十六年(1521)升浙江提学副使,考核诸生必以敦行力学为上。嘉靖二年(1523)升广西右参政,平定洛容、马平、田州、平乐等处叛乱,皆用其策,而嘉靖四年(1525)亲檄客舟数十打通断藤峡阻隔近七十年的交通,更见其胆识。后岑猛部下复叛,久征不下,朝廷命王守仁(阳明)总制徂征,钟芳又献分置土官之策,遂不劳而定。嘉靖七年(1528)升江西左布政使,区画藩禄军需,擒治奸吏豪民,闾省肃然大治。嘉靖九年(1530)升任南京太常寺卿,得报即南归展省先茔,次年三月始到任,议礼得朝廷首肯。寻摄国学,讲论经义,求诸身心,为诸生所折服。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兵部右侍郎,对马快船等秕政,有所因革。嘉靖十二年(1533)改户部右侍郎,奉敕总督太仓,多所设施,漕政

大举。其时大同军乱，钟芳上疏请只诛叛逆，招降胁从，与当道不合，因以获谴，后才奉旨复职。嘉靖十三年（1534）获准致仕，家居十馀年，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病逝，享年六十九岁。他的生平行事，与同生活于明代中期的琼人唐胄颇有相似之处，二人皆是学问与事功并重，可惜唐胄的《西洲文集》至今未见全本，所以显得钟芳的《筠溪集》能重新出版更其珍贵。

如果对照钟芳与王守仁（阳明）的履历，钟芳考中进士的正德三年，正与王阳明龙场悟道同一年。此后二人的踪迹，除了嘉靖七年在广西共事外，正德五年至十一年二人在江西、南京也应有过交往。所以王阳明在江西南安逝世后，钟芳曾为文祭奠他，自述“某岭海末学，忝在交游，宦迹所经，每亲绪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也就在此段时间。王阳明心学对程朱学派的大胆异议，特别是它所带有的思想解放的锋芒，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反对他的人固然很多，而赞同和追随他的人也为数不少。钟芳作为一名笃信儒学的士大夫，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从《筠溪集》中保留的书简、赠序和论文来看，他同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交往并不止王阳明一人，同罗钦顺（整庵）、湛若水（甘泉）、何瑭（柏斋）、王廷相（浚川）、吕楠（泾野）等都有颇深交谊，对当时有争执的理学问题都曾往复论难。其中罗钦顺对钟芳尤为推

重,他的理学专著《困知记》即特意请钟芳作序,钟芳写给他的书简中有三封专门讨论理学问题。钟芳写给王廷相和吕楠的赠序和书简也有多通,王廷相的《慎言》一书和诗集也是钟芳作序。这些都说明了钟芳在当时理学界的声誉和地位。所以与钟芳同时的海南名贤林士元,在为其《筠溪文集》作后序时认为,钟芳是与罗钦顺一样,都可入《国朝理学名臣录》的人物,评价不可谓不高。

中国的儒学,到宋代进入了理学的发展阶段,其主流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但与朱熹同时,也出现陆九渊(象山)的“心即理”的不同声音,而到明代中期随着王阳明的崛起,正式形成了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体系。对于钟芳的理学思想,一般都认为是属于程朱一派。黄佐《筠溪钟公墓志铭》说他“论学以程朱为宗”,林士元《筠溪文集后序》也说他“公固宗主考亭(朱熹)。”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如果通读《筠溪集》中有关理学的论述,就会发现,钟芳在维护程朱一派理学正统的同时,并不全盘否定陆王心学的观点,而是持存而不论甚至兼容折衷的态度。当时林士元也看到这一点,所以在“公固宗主考亭”一语之后,又说钟芳是“欲合象山,取两长乎”。钟芳的这种态度,在其《祭王阳明文》中表现至为明显。他先指出王阳明学说的“求言自近,实践精思,力排多闻,专务守约”“贰于程朱”,“于程朱之说每多齟

齟”之处,但同时又承认“存诚涵养,正惟孔氏家法,要其指归固不出程朱范围内也”,“盖其过激处于圣教未尝损,而鞭辟近里处于学者则有益也”,从而主张“退而取其大旨,略其异同,循其所可循,而不辨其所不必辨”。这是一种颇为客观的治学态度。

下面我们不妨从程朱与陆王有根本分歧的若干论题上,看看钟芳的观点究竟如何。在心与理的关系上,朱熹乃将心与理分而为二,王阳明则与陆九渊一样,主张“心即理”,认为“天下无心外之物”,亦无“心外之理”,在强调心的本体性时,却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存在,这显然是很大的偏颇。而钟芳则说“理无内外,心亦无内外”(《讲学》),似乎有意在两派之间找到一个调和点,并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体现出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陆九渊皆主张先知后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钟芳则说“知以利行,行以践知”(《讲学篇赠以中陈子》),“学无大小,以行为本”(《临川吴氏评通志》),“不患不知,患不能行”(《读书札记》吴临川条),更加强调实践的意义。在如何求知的问题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即通过探究外界事物的原理,来获得规律性的认识,而王阳明却要“致良知”,“求理于吾心”,即通过静坐省察的功夫达致天理与道德的完善。钟芳一方面认为“分知行为两截,恐亦未然”,但也批评王阳明“只欲求之于静定”,是“诚

为牵强”(《奉整庵第三书》)。他的主张是“兼动静而言之”,“正乎外者所以养乎内,存诸内者斯能制乎外”(《存养》),向外求知与向内省察兼行而并至。在由知行衍生出的博与约的问题上,钟芳则对王阳明的“于博闻多识若有不屑”持否定的态度(《存养》),反问“欲通古今之变,商天下之故,非博诸闻见,何以能济”(《临川吴氏评通志》)。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钟芳的理学思想乃出入于程朱和陆王之间,欲取其两长而融贯之,追求实学的趋向比较明显,在部分士大夫醉心于“心性”之学的明代,应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钟芳思想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比较鲜明的唯物的倾向。身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他当然不会脱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窠臼。但对宋儒陈同甫大讲“天道六十年一变”之事,他词气激烈地指出“人臣告君,唯当匡之以义,不当眩之以天数”。又批驳班固五纬(一种星象)以时顺逆之说乃谬言(《五纬》)。他还自称“平生少仙骨,方术休任真”(《同年朱士光留酌》)。指出世间若有神仙,“是逆天地之化也”(《读书札记》戴记曰条按语),而方术之说,只是道家的寓言,“内丹虽成,亦无不死之理,加以金丹燥烈,是又促其死也”(《再论参同契》),此言不知是否针对嘉靖皇帝迷信道术而发?又说“祀者致吾诚而已,徼福妄也,淫祀谄也”(《读书札记》或曰先祖条按

语),此说即使在今天仍有反封建迷信的现实意义。他笃信儒家教条,但却非食古不化,而是以权时通变作为自己的思想方法,说“学莫大于知变,知变而后能权,权非计数之谓,言酌时而从道也”(《道义》),“是故守经非难,精于义者为难,知经者可与言立,知义者可与言权,此儒者之用也”(《送王佥宪德馨序》)。所以他不赞同丘濬对许衡仕元的批评,认为在“胡元既混一,为区内民,则时势不同,难执此说”(《复邓沃泉宪副》),从而对许衡取宽容的态度。他对大自然的认识,也有可取之处,如他说“潮为地之嘘吸”(《潮汐》),似乎就有点接近于“地心引力”的说法。这些都是他思想中的过人之处。

钟芳从正德三年(1508)走上仕途,到嘉靖十三年(1534)退休,为官将近三十年,仁民爱物的为政思想贯穿始终,并处处体现于《筠溪文集》之中。“夫政以顺民欲恶为要”(《贺节推林君》),“而以惠泽及物为贵”(《乐会尹曹君遗爱碑》),“夫仁者不负其民”(《送何子鱼》),“非仁民无以伸事上之义”(《送同年李崇纲》),“而所以责乎君上者,尤拳拳用民力,重民时”(《春秋集要序》),此皆统言治民须行仁政。而仁政的要义又在于轻徭薄赋,政简刑清:“民之困征赋而不自存久矣”(《送范邦秀之河南序》),“大抵此时民穷财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复张都宪》);“史称牧之良者,曰政平讼理,平而

理,仁之施也”(《庆琼郡侯后溪黄公寿序》),“政以敷治,刑以辅政,政所不及,不得已而后刑”(《送节推见泉林侯上最序》),“刑尚清而汨之,民尚静以挠之,以喜事为能,以循敕为无为,皆欺也”(《赠节推王侯上最序》),“孰知以无讼为贵哉”(《读书札记》黄庭坚条)。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他也耿耿地以不可多杀为言:“予昔参广西政,每憾多杀不能已乱,徒以长乱”(《琼山县平黎记》),“善杀不如善怀”(《复蔡半洲都堂》),“才有一毫上首功,喜多杀之意,则与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佑”(《与程参戎》)。可谓仁者之心,灼见于中矣。

而对于海南本地的文史研究而言,《筠溪文集》又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对于汉元帝初元三年弃珠崖后,海南与中原属于何种关系,钟芳之说与王佐、唐胄又略有不同:“自弃之后,民夷无主,豪黠擅命”,“初马援置交趾郡……而珠崖、儋耳不在九郡之列,有贡献者则于徐闻达之,名曰珠崖县”(《黎议一》),有意于琼史者不妨加以比照。对于明代士子科考的状况,钟芳亦言在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省督学尚渡海周巡,次年因督学朱端彝巡崖归省病逝,遂托言崖州瘴疠所染,次年督学只到万州调考,后又托言琼州海峡有海和尚登舟攫人,自此督学不渡海,只在雷州调考(《怀督学朱公》后注),此可补王弘海《请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的不足。海南明代是否尚

产珍珠,钟芳于代作的《急缺金银宝石珍珠疏》中说“本省所属系雷廉二府池内产有珍珠”,则琼已无珠可采。至于明代海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形成原因及应对之策,《筠溪文集》中言之最详,不仅在《琼崖各论》有多篇专论,且多篇序记及书简中都有详述,足资研究的参考。而该集的志状碑铭中,述名贤陈实、吴会期、俞宗梁、唐鹏翼、唐胄等家世行实甚翔实,尤其是唐胄,既有墓志铭,又有祭文和《西洲文集》序,保存了不少的史料。治史者入山探宝,必有所得。

明代理学家对诗文的要求,大抵不出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宗旨,钟芳也不例外。他在《西洲文集序》中自言“予吟思故涩,于诗未知所评,文虽素业,仅唯达意,不能易新格,逐时尚”,虽为谦词,但亦透出求实的指向。《筠溪文集》中此方面的论述尚有不少。关于文,他说:“古今文体不同,同归于实。理,实理也,事,实事也,载之以辞则至文也。”(《读书札记》古今文体条)“盖徒知工于文即所以明道,而不知溺于文乃所以害道也。”(《史义拾遗跋》)关于诗,又说:“志也者,诗所本也,诗也者,志所寓也。”(《王氏家藏集序》)“诗贵兴致,不贵组丽,组丽近文,兴致近情。情达乎文,虽文而朴,文掩乎情,徒文而艳。”(《书西游录后》)这些便是他对诗文两途的基本见解。《筠溪文集》中各体文章十九卷,诗歌六百多首,文

固然以说理致用为主,诗亦是每每言经史、寓理致,所以黄佐评其“为文雄浑精深,气随理昌”(《钟公墓志铭》),黄衷评其诗“写性灵而导醇气”,“悠扬沉郁”(《钟筠溪家藏集序》),皆不越其诗文蹊径。当然这不等于说钟芳的诗文即不追求艺术性,文中如为议礼被贬诸臣求情的《广圣孝疏》的委曲周至,《送琼州林太守序》的设喻精当,皆不失为名篇,诗中如七言歌行的深婉、绝句的清新,亦可跻于当时的大家之列。

钟芳于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于诗文集之外,还著有《学易疑义》、《春秋集要》二书,而诗文集在论道论学之外,还及于论礼论乐,甚至及于地理天文等,故尔黄佐说他“为学博极而精,虽律历医卜之书,靡不贯通”,确是所言不虚。据其自序所言,《学易疑义》乃从象以揭体、变以显用、辞以阐微、占以致决四个方面发明圣人的精蕴,而《春秋集要》则是采辑要略,以明“人心得丧之机,而治乱兴亡之所由决”。《春秋集要》一书亦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并由馆臣撰有提要,指出其中谓“春王正月”为建子、桓公三年书“有年”非纪异、襄公二十八年书“卫侯衎”非俟其改过、昭公元年书“败狄大卤”非讥崇车毁卒等数条有异于前人,其他大抵依沿宋胡安国《春秋传》之说。再据林士元《筠溪文集》后序的说法,于先儒有订正之功的,除了《学易疑义》、《春秋集要》二书外,还

有文集中乐论、史论、读书札记诸篇，读者有兴趣者不妨细考之。

上文说过，我们点校《钟筠溪集》是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以底本，但只此一本而已，并无别本可以对校。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以本校、他校、理校等多种方法尽量作了校勘。为了便于读者，对于原文中凡可以确定的文字讹误，径行改正，为避免烦琐，亦未出校记，唯偶有异文疑义难于遽断者，或个别因原字缺损依稀似为某字但又难于确定者，才出校记以备考，而完全无法辨认的字则以方框代之。至于繁体字改为简体字、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异体字统一为通行字、通假字古今字则保留原字等等，一如一般的规则进行，兹不必赘。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丘濬之咏五指山也，“鹏味高骞吸晓虹，却怜孤绝自为宗”，钟芳之咏崖州鳌山也。若可以丘濬在海南的学术地位比作五指山，那么钟芳俨然即为屹立琼岛极南之鳌山，他们与岛上其他峻拔的高峰一起，共同点缀着海南文化历史的天空，他们的光芒，必将垂耀后昆，以臻于不绝。

周济夫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完稿于石竹斋

钟筠溪先生家藏集序

文，造化之华也，随所业而见焉。夫操觚摘藻，回斡气机而轩轾世道，鸣当时以俟来哲，作者亦多术矣。然敏纂著者或惜于赋咏，晰数典者恒瞽于筹今，滞一曲而蔽全能者皆是也，矧乎精神心术之微，又可易易言哉！户部右卿钟公筠溪博综载籍，奋自海甸，扬历中外馀三十年，宦辙所至治洽化行，而纪述弥盛。始予尘逐四方，间获篇什，穷日玩绎，每内自愧沮曰：“管中一斑，如是耶！”比屏居丘樊，公亦遗荣以归，尝拜乐论之辱，盖深赞其志，而恨不数面以竟夫兑泽者，公乃堂堂乘化矣。呜呼痛哉！嘉靖戊申，公震器郡守汝益类辑群制，所谓《家藏集》者，凡序记、碑志、论说、书简十有七，奏疏二，札记、经世图续五，诗六，萃三十卷，付予以言。忆岁壬寅，公已病眩，犹力序鄙文，知公殆深于予也，言容毫辞耶？于是肆观斯集，具七美焉。夫弘纲综目，异体别裁，根柢道要而陶冶物类，惟形付色，祛雕镂而振衰腐，恹乎汉型魏局，加冲确焉，其文昌矣。古风近体，高调雅曲，写性灵而导醇气，其思永，其声谐，其原六义，其蹊骚选也，乃若宣幽识遇，悠扬沉郁，唐韵而宋材乎，其诗工矣。动静存养之功，阴阳

道器之辨，铢分缕析，昭指掌而端贯珠，卓然祖邹鲁，宗周程，而的派朱张也，其道正矣。祀事复仪，储政蠹习，知而言，言而尽，但区区职务已耶，揭无所逃之义，示臣鉴焉，其忠懋矣。南侵北扰，国势焉系，上建白而下文告，因乱以图治，去弊而即功，古有然者，庶无憾于宣公乎，其略远矣。语人于叔世，鲜端亮而盛俭邪，固也，史论发原心之恕，而谨嫌疑之防，其识超矣。律吕之变，皇极之敷，儒先几于讼矣，若夫准经援史审其中，始终消长衍其会，温公康节之末响赖焉，其择精矣。呜呼！公乎精神心术，其果寓于兹乎，抑犹复造化之华也？今夫天雨曜悬象，繁星竞彩，谓足以尽天乎？未也。必壮霆怒飏，祥眚寒燠，俄顷万变，而一敛无迹，天之为观始备。今夫海涵天泛地，演漾无际，谓足以尽海乎？未也。必蜃楼腾阴，海市呈霁，倏然龙斗鳅踊，驱洪涛而岳立之，神夺而目不暇瞬，海之为观始备。予也，盖懵于谈天而恇于涉海者，晚序斯集，方窃幸于备观云。

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抚云南湖广地方兼赞理军务右副都御史南海黄衷撰。

目 录

前言	(1)
----------	-----

钟筠溪先生家藏集序	(1)
-----------------	-----

卷一

序类

新锓《左传》序	(1)
---------------	-----

重刊《稽古录》序	(2)
----------------	-----

《考亭源流录》序	(3)
----------------	-----

送少参张君之任东广序	(3)
------------------	-----

送章夔州世衡序	(4)
---------------	-----

送金宪潘君预选之河南序	(6)
-------------------	-----

送潘希古金宪序	(7)
---------------	-----

送福州太守叶君时用序	(8)
------------------	-----

送沈君尧卿之顺庆序	(9)
-----------------	-----

送南京太仆卿砺庵毛公序	(10)
-------------------	------

送杨子朝鲁之鹤庆太守序	(11)
-------------------	------

送贰守唐君之宝庆序	(12)
-----------------	------

送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泾川张公致政序	(13)
--------------------------	------